

学术文库

北京市新^型城市形态： 缘起与构成

BEIJING NEW URBAN FORMATION:
ORIGIN AND STRUCTURE

李慧芳 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青年创新人才学术文库

北京市新^型城市形态： 缘起与构成

BEIJING NEW URBAN FORMATION:
ORIGIN AND STRUCTURE

李慧芳 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郑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市新型城市形态:缘起与构成/李慧芳著. —郑州:
郑州大学出版社,2011.9
ISBN 978-7-5645-0518-9

I. ①北… II. ①李… III. ①城市建设-研究-北京
市 IV. F299.2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43650号

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大学路40号

出版人:王 锋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新乡市凤泉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开本:710 mm×1 010 mm 1/16

印张:10

字数:192千字

版次:2011年9月第1版

邮政编码:450052

发行部电话:0371-66966070

印次: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645-0518-9 定价:25.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前言

PREFACE

随着奥运会的结束,北京市及时提出了“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口号,从而规定了北京市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发展的整体特征,这种规定其实就是一种有关新型城市形态的描述。因为从形态学和社会学的角度上看,城市形态是指城市的整体形象特征;“新型”在这里的含义是指从发展理念、建设内容和文明形态等角度去定位城市形态,以及北京市区别于其他大城市的“新面貌”之处。所以,对北京市新型城市形态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对“三个北京”理念在理论上的充实。

新型城市形态是城市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全方位自觉创制,表现为城市的整体形象、共同联系机制和具体机制,据此,新型城市形态至少应当包含首都意识、城乡统筹、经济生活和城市形象等内容。而要达到这种状态,即创建新型城市形态,则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的工程。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新型城市形态所体现的城市整体形象特征并非先天性的一体化特征,而是由其构成要素在运行过程中通过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因此,了解并掌握新型城市形态的主要构成要素的运行机理,对于新型城市形态的创建具有重要意义。根据社会系统论的观点,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主要由三种要素构成,即该社会系统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对于北京市新型城市形态来讲,考虑到北京市当前所处的城市化背景,本书分别从政治、区域经济、人口和城市面貌的角度选取了四个基本要素:政府职能、城乡关系、社会群体和生态环境,从这几个方面来阐释并理解创建北京市新型城市形态的基本要求。

简单来讲,政府职能表示城市形态的政治结构与功能。政府职能实质上是对社会各领域的组织与协调,充当着各种矛盾



调节器、导航器的角色。对于北京市来说,政府职能对新型城市形态的支撑在于建立起利益协调、信息沟通、平等对话等一整套协调机制,以处理好中央与北京的关系、北京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和北京特殊的城乡关系。城乡关系表示城市形态的经济结构与功能。在实际中,城乡关系主要表现为城乡统筹的系列工作,城乡统筹的内容又可以概括为农村和城市在主体、要素和区域等方面的统筹,只有使农民和城市居民共同构成城市主体,农村和城市共同组成城市空间,农业融入到城市经济产业中去,才能实现城乡统筹对新型城市形态的支撑作用。城市中的人口关系表示城市形态的社会结构。作为城市的建设主体,城市中的不同人群能否形成城市的建设合力直接关系到新型城市形态建成与否的问题,所以,对不同社会人群进行资源占有、利益分配以及权利拥有等方面的协调,使他们相互认同是处理好人口关系的关键。生态环境是城市的生存环境。由于城市生态环境本身所具有的社会特征,所以也视其为支撑新型城市形态建设的社会功能要素。现代工业化带来的各种资源、环境问题是城市生态环境中最大的问题,改善城市中的人类活动则是改良生态环境的主要途径。

本书在研究北京市新型城市形态基本要素的过程中重点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城市形态理论的研究视角是多元化的,甚至是庞杂的,如何从诸多的理论中选取适合本书的理论视角并作出恰当的界定?

第二,城市形态本身就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既然如此,又该如何理解本书的“新型”城市形态?这种“新”跟一般的城市形态发展有何不同?

第三,如何界定北京市新型城市形态的含义?

第四,城市形态的内容很多,如何确定其基本要素?这些基本要素又是如何作用于北京市新型城市形态的?

本书的写作主要基于对北京市城市发展的实地考察和对近年来北京市市情资料的搜集,例如,京津冀城市群规划及其对北京市发展的影响,北京市外来人口的特征与发展趋势,北京市城乡统筹的特殊性与进展状况,北京市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以及北京城市规划、北京统计年鉴等都是本书写作的重要数据和资料来源,为深刻认识北京市新型城市形态建设的现实条件提供了确凿的资料。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孙津教授、施雪华教授、朱光明教授,以及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和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等诸多老师的悉心指导,他们提出的许多宝贵意见令我受益匪浅,并最终完成了《北京市新型城市形态:缘起与构成》的写作。

《北京市新型城市形态:缘起与构成》全书正文共四章:第一章是问题的提出,主要说明了新型城市形态的概念及相关理论的缘起;第二章是北京市城市形态的发展与变迁,理清并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市城市形态发展的基本

状况与特点;第三章是创建北京市新型城市形态的必要性与现实性,分别从必要性和现实性两个角度分析了当前北京市创建新型城市形态的基本条件;第四章是基本要素分析,主要分析了政府职能、城乡关系、社会群体和生态环境等四个要素的基本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对北京市新型城市形态的影响,以及相关解决路径的探讨等,这部分也是全书的主要部分。

《北京市新型城市形态:缘起与构成》可以视为中国城市化研究的一个个案分析,即从静态的角度树立起城市化进程所应达到的基本规范。本书以北京市的城市发展现状为研究蓝本,但由于北京市在中国城市中特殊的角色与地位,因此,希望本书除了可以为北京市城市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之外,也能为其他的城市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参考作用;同时,笔者热切地希望得到政府工作人员和广大理论工作者的批评和建议,共同为中国的城市发展作出贡献。

李慧芳

2010年5月

李慧芳,女(1982-),汉族,河南省济源市人,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人文社科系行政管理专业教师。201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行政管理专业,获管理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城市化和城乡统筹。先后在各级各类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主持或参与各级(包括省部级)项目研究六项。





目 录 CONTENTS

导言	1
0.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
0.2 研究综述	4
0.3 逻辑结构与研究方法	12
0.4 主要观点和主要问题	14
第1章 问题的提出——新型城市形态的缘起	17
1.1 形态与城市形态的界定	17
1.2 提出“新型城市形态”的意义	20
1.3 “新型”的含义	22
1.4 支撑新型城市形态的要素	23
第2章 北京市城市形态的发展与变迁	25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3年)的北京市 城市形态	26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1953—1957年)的北京市 城市形态	27
2.3 计划经济时期(1957—1978年)的北京市城市 形态	29
2.4 改革开放时期(1978年至今)的北京市城市 形态	31
第3章 创建北京市新型城市形态的必要性与现实性	39
3.1 城市自身发展对新型城市形态的要求	39
3.2 北京市特殊角色对新型城市形态的要求	46
3.3 创建北京市新型城市形态的现实性	52
3.4 北京市新型城市形态的真实含义	63
第4章 基本要素分析	71
4.1 北京市政府职能的现状 & 特殊性分析	72

4.2 北京市城乡统筹分析	88
4.3 北京市人口关系分析	107
4.4 北京市生态环境分析	129
结语	141
参考文献	144



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而理论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升华。奥运会之后,“新北京”建设已经提上日程,对此,“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以下简称“三个北京”)的提出无疑为“新北京”建设提供了一个纲领性目标和一种理论上的指导,而具体的实践需要完善的理论指导,因此,对“三个北京”进行理论上的完善不仅是理论本身的要求,也是北京市实际建设的要求。基于此,本书对北京市新型城市形态理论进行的研究,不仅为“新北京”建设提供了理论上的扩容,也为“新北京”的实际建设提供了参考。

0.1 研究背景和意义

0.1.1 研究背景

城市形态是一个城市运行机制的整体特征,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时代性,是衡量、分析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从整个社会背景来看,我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城市化是该过程中的一个主要特征,而城市形态的演进又是城市化的一个主要表现。正如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所有城市化运动一样,城市形态的演进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自然现象,而是一种复杂的社会过程。在此过程中必然会涉及方方面面的工作,如城市形态的目标设定、形成机制、相关政策制定、相关社会问题等。要做好这些工作,就需要从城市形态的基本构成与功能的层面上进行研究,即对城市形态的基本要素进行研究。

从北京市的特殊角色来说,作为首都,北京不仅是我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更是一个超大型的城市,且自身功能也正在日益国际化。在城市化进程中,北京市的城市形态建设不仅面临着一般大城市所固有的问题,如人口问题、社会稳定问题、资源问题等,也要面临其自身特有的问题,如首都角色的打造、对其



北京市新型城市形态
缘起与构成

2

他城市的辐射与带动功能、特殊的城乡统筹关系等,这决定了北京市的城市形态建设必然会不同于国内其他大城市,也就是本书所提的“新型城市形态”建设;而要创建出这种“新型城市形态”,就有必要对其基本构成要素进行专门分析,从而为更好地理解与建设北京市的“新型城市形态”奠定基础。

在此背景下,对北京市创建一种新型城市形态的构成要素进行研究就具有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双重意义。

0.1.2 理论意义

0.1.2.1 有利于城市形态理论的发展

形态是一种特征化的统称,所以,城市形态主要指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整体形象特征。城市形态理论主要内容为支撑城市形态的基本要素、城市形态的运作机制以及城市形态的发展前景的研究所形成的理论。

从城市形态理论的整体意义上来看,城市形态的发展要求城市形态理论应该是不断更新的,相对于实践,更应该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意义。静止的城市形态理论无法对不断变化的实践作出相应指导,因此,本书提出“新型城市形态”概念的本身就是对原有城市形态理论的发展与更新。从“新型城市形态”的具体内容来看,“新”既指研究视角的更新,即从发展理念、建设内容和文明形态的意义上对北京市城市形态的构成要素进行研究,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理念范畴;“新”又指北京市本身区别于其他特大城市的“新发展”、“新面貌”,又是对城市形态理论在内容上的充实。

0.1.2.2 有利于城市形态理论研究层面的拓展

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构成城市形态的基本要素。城市形态的基本要素与城市的基本要素不同,一个城市的基本构成要素是指在城市中具有某种功能又无须再进一步细分的单元,如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城市的主要产业、城市的主要科研机构等;而城市形态是一种城市的整体形象特征,所以,城市形态的基本要素就是指那些能够产生或形成某种整体形象特征的基本构成要素,包括物质结构(经济或产业结构等)、运作机制(体制、政策、法规、发展导向等)和精神面貌(文化、价值观、形象等)方面。所以,本书选取其中最基本的几个要素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它们具体是什么,以及它们怎样对城市形态产生影响。这几个基本要素包括政府职能、城乡统筹、人口关系、生态环境等几个方面。

城市形态的基本要素作为支撑城市形态的基本因子,对整个城市形态的发展和建设起着基础性作用,在这个层面上进行研究,相当于深入到城市形态的

“细胞”层面上,对城市形态的结构与功能进行分析。所以,这样的研究是对整个城市形态理论研究层面的拓展,对城市形态理论起到了关键的补充作用。

0.1.2.3 有利于城市形态理论特殊性研究的落实

城市的差异性决定了城市形态理论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从本书研究对象的载体——北京市的特性上来看,北京市在中国和国际上的特殊角色及其自身发展的特殊轨迹,决定了本书对其创建新型城市形态的要素的研究正是在城市形态理论普遍性的基础上,对城市形态理论特殊性的拓展。

0.1.3 实践意义

0.1.3.1 有利于城市现代化进展

实践与理论的关系表现为:理论来自于实践,再指导实践活动,然后经实践检验后再升华。城市现代化的不断推进意味着城市文明的升级,同时也意味着作为城市文明体现的城市建设、城市规划、城市的功能布局等需要不断地更新、完善,对城市形态的基本要素的研究有利于从城市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层面上认识城市形态的现状,为城市现代化的进展提供理论上的支撑。

0.1.3.2 有利于政府治理

对于城市管理的主体——政府来说,一套完整的、具有指导价值的新型城市形态理论是掌握城市形态变化、预测城市形态发展的必备工具,也是提高政府职能有效性的重要途径。掌握新型城市形态要素的基本规律则是掌握整个城市形态理论的基本前提,也是政府合理安排城市布局、制定科学的城市规划政策、创新城市管理体制、构建和谐城市的关键第一步。

0.1.3.3 有利于“三个北京”的落实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为北京市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发展契机,北京市提出了“新北京、新奥运”的口号。如何保证北京市在奥运之后仍能以一个独立的姿态发展出新意是一个长期的问题,而“三个北京”即“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提出已经为新北京建设提供了总体发展方向性。在这个背景下,一方面,新北京的建设必然是一种“新型城市形态”的建设;另一方面,对构成新型城市形态的基本要素进行研究,不仅会充实“三个北京”的理论内容,为北京市的发展提供最基本的理论依据,而且有利于“三个北京”在实践层面上的落实。

北京市新型城市形态
缘起与构成
……

4

0.2 研究综述

根据本书的研究需要,此处把有关城市形态的研究综述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关于城市形态发展的研究综述;二是关于城市形态构成要素的研究综述。

0.2.1 关于城市形态发展的研究综述

“读史可以明智”,了解城市形态发展的相关研究,对于把握城市形态研究的现状以及发展的方向无疑是必要的。由于城市形态本身的多层面性、多样性,以及包含在其中的不同社会理念和人文观念,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出发,对城市形态问题进行了多视角的研究,包括地理学、规划学、建筑学、社会学等,并取得了显著成果。由于本书的研究范畴所限,此处选取的仅仅是和本书的研究内容相关的城市形态理论研究。国外学者对城市形态的相关研究主要分为形态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两大方面。国内的城市形态理论研究由于受整个城市近代化进程较晚的影响,其发展一直落后于欧美等国,长期处于滞后的状态。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给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城市形态的理论研究才取得了很大进展。国内相关研究可以分为形态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

0.2.1.1 城市形态的形态学研究

(1) 国外城市形态的形态学研究

在西方,整个形态学的研究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步调相一致。

早期的空间形态理论认为,城市由基本空间元素组成,它们构成了不同的开放与围合空间和各种交通走廊等。空间形态研究从不同的规模层次分析城市的基础几何元素,其目的是试图描述和量化这些基本元素和城市之间的关系。这一方法不仅强调要分析空间形态的几何特性,更重要的是要分析蕴含其间的社会与人类学意义。

在近代资本主义城市工商业迅速发展的推动下,从19世纪初开始,在欧美城市中出现了一系列着眼于城市形体面貌、倡导城市宽敞壮美的新古典主义式的城市改建。例如,在欧洲由奥斯曼(Haussmann)于1853—1870年主持的巴黎改建;在美洲,从1893年芝加哥博览会起,由本汉姆(H. Bunham)主持的旧金山、克里夫兰和芝加哥等城市的空间发展和治理规划。尽管这些庞大的城市改建计划在一定程度上或区域内美化了城市,但是由于缺乏对城市居民利益的

考虑和照顾,所以并没有在实际层面上解决近代工业城市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从19世纪末起,随着学者们对城市形态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在实践中的运用,传统的城市形体规划方法发生了重大变化:从重视城市的美化转为强调城市形体规划要适应新的城市功能需要的原则。其代表性理论是美国建筑师佩里(C. Perry)1929年提出的邻里单位理论和斯泰因(C. Stein)1933年提出的雷德伯恩体系。此外,在新建筑运动的影响下,“功能合理至上”在城市形态研究中得到强调,代表人物是勒·柯布西埃(L. Cirbusier)。柯氏明确地以建筑师的眼光来看待现代城市建设,1922年他完成了《明日的城市》一书,1925年提出了著名的“伏埃森规划”,1933年又推出了“光辉城市”的规划方案,强调用现代技术手段来引导城市人口的集中。

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西方流动性的中产阶级主导并形成了一种相对分散的城市发展模式。这一时期的城市形态设计一方面转为更加务实的态度,不再将整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而是把城市分为不同的地段,并对不同地段形成了不同认识和不同的处理方法。如1947年迪肯森(R. E. Dickinson)提出三地带理论(Three Zones Theory);1963年塔弗(E. J. Taaffe)、加纳(B. J. Garner)和蒂托斯(M. H. Teatos)根据城市发展提出了城市内部结构的理想模式;1975年洛斯乌姆(L. H. Russwurm)在《城市边缘区和城市影响区》一文中描述了现代区域城市结构;1981年穆勒(Muller)指出大都市空间结构模式由四部分组成,即衰落的中心城市、内郊区、外郊区、城市边缘区。另一方面,城市形态研究也扩展到进一步运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对未来城市形体的构想和探索中。如库克(P. Cook)的插入式城市(Pluged City)、丹下健三的开敞式都市轴、富勒(B. Fuller)和竹菊清训的海上漂浮城市(Floating City)、赫隆(R. Herron)的行走式城市(Walking City)、弗里德曼(Y. Friedman)可动建筑研究组(GEAM)的装配式城市、波利索夫斯基的吊城方案、索莱利(P. Soleri)的仿生城市(Arcological City)等。总之,注重人类情感的需求、依靠高科技手段、关注生态环境的思想是未来城市物质形态发展的基本走向。

(2) 国内城市形态的形态学研究

国内学者对城市形态的形态学研究大致分为两个部分:内部结构研究和外部形态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在大量的城市规划建设实践的推动下形成的对城市物质形体设计方法的研究就属于城市内部结构研究。例如,胡俊(1995)提出了中国现代城市空间结构的基本模式,该模式以工业用地布局为主导,以各项用地有计划地配置为特色;东南大学的齐康先生(1997)从城市形态理论与方法出发,构建出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规划设计系统;王建国(2001)从方法论的角度出

北京市新型城市形态...缘起与构成

6

发,构建了一个从城市形态到城市设计的分析操作过程;姚士谋(1992)认为,中国城市用地的分布呈现出核心地段、通向外围的地段、市郊边缘地段以及城市外围地段等分层性的结构特征,各个地段分别具有不同的功能。

中国城市外部形态的研究具有时代性特征和中国特色,研究的总体趋势是城市发展的区域化、群体化。较早的城市外部形态研究大多从传统的形态学角度进行城市形态的分类。例如,武进先生(1990)把城市外部形态划分为集中型城市和群组型城市两大类,并对两类城市形态进行了具体划分,即集中型城市包括块状形态、带状形态和星状形态等三种类型;群组型城市则包括双城形态、带状群组和块状群组等三种类型。顾朝林等(2000)指出,大城市的空间增长表现为圈层式、飞地式、轴间充填式和带形扩展式四种形态。近些年来,我国学者开始考虑在信息、技术等时代因素的基础上,进行城市形态的分类。例如,张鸿雁(2003)依据城市发展的主导因素,把现代城市分为四种:数字城市、后汽车时代城市、边缘城市和绿色生态城市。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2003)则根据潜组织的成长水平,将城市形态划分为五种:开放型城市、成长型城市、停滞型城市、衰退型城市和濒危型城市^①。

随着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我国对城市群或都市圈的研究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其中,早期的研究多是理论上的探索。姚士谋(1992)探索了城市群发展的规律、空间分布和发展趋势。朱英明(2004)以“城市群”这一独特的经济空间作为切入点,对城市群经济空间联系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提出了未来中国城市群经济空间联系的发展趋势。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成果也开始涌现。吴良镛(2002)提出采取“交通轴+城镇组团+生态绿地”的发展模式,塑造区域人居环境的新形态。王乃静等(2005)针对山东半岛城市群提出了“三圈网络式”发展模式与发展战略。其他的实证研究成果还包括:左学金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研究》(2006),喻新安的《中原城市群一体化研究》(2007),王发曾的《中原城市群整合研究》(2007),马四栋的《区域协调与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2007)等。

0.2.1.2 城市形态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

对城市形态的社会学研究是中西方学者共同关注的领域;对城市形态的政治学研究则更多地为国内学者所关注。鉴于从社会学角度和从政治学角度对城市形态进行研究的高度相关性,此处,把国内学者对城市形态的社会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归置一处。

^① 城市价值及城市形态的演化模式[J].领导决策信息,2003,(6):22-30.

(1) 国外城市形态的社会学研究

国外学者对城市形态的社会学研究主要源自创立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

19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引发了迅速的城市化运动,其影响遍及欧美,到20世纪初期,整个欧美都已实现了工业化,1920年城市人口的比重(不包括前苏联)已占总人口的32%,城市化开始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由于城市快速增长,流动人口迅速增加,大量城市问题涌现出来,开始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芝加哥学派正是基于关注城市社会迅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社会互动形式、社会联结体、聚居方式的改变,以及各种社会问题的产生而创立的。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是帕克(Robert E. Park)。他主张对人类群体行为的研究,不是放在抽象的,而是放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制度中进行,那就是城市。他借用了生物生态学的理论来研究社会,开创了社会生态学的研究领域。他认为,以往人们对城市的了解仅限于一些小说家的描写,这很不够,还必须对当今的城市生活进行更深入、更公正的研究。他在文章中提出了研究城市的纲要:要研究城市的“具体组织,研究它的各种职业,并且,研究它的文化”。

这个学派随后分为几个不同的学派。

第一个是传统人文区位学派(Classic Human Ecology)。其代表人物及理论包括伯杰斯(Ernest W. Burgess)于1920年提出的同心圆理论(Concentric Theory),霍默·霍伊特(Homer Hoyt)于1939年提出的扇形理论(Sector Theory),乔塞·哈里斯(Chauncy Harris)和爱德华·厄尔曼(Edward Ullman)于1945年提出的多核心理论(Multiple Nuclei Theory)。他们认为城市是一种生态秩序,支配城市社区的基本过程是竞争和共生,如同生物体一样,人类社会中人與人之间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决定着城市的空间结构;他们的区别在于对城市空间结构的不同勾画。由于传统人文区位学派所观察到的城市结构的各种形状如同心圆、扇形、多核心等,具有浓厚的“决定论”色彩,未能充分考虑不同特性社会的具体内涵与特征对于空间形成过程的不同作用,因此,后来的学派更加关注人们的心理、价值等社会文化因素,把空间看做某种文化价值的象征,区位活动不仅具有经济取向,还具有情感及象征意义,而且情感及象征意义会反过来影响区位活动的运作。

第二个是现代人文区位学派(Modern Human Ecology)。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的现代芝加哥人文区位学派,改变了以往人们仅仅注意城市土地利用造成的空间结构问题,开始涉及美国城市区位结构变化的本质。这其中又划分为三个支派,一是新正统区位学(Neo-Orthodox Ecology),由阿莫斯·霍利(Amos Hawley)、詹姆斯·奎因(James Quinn)、莱奥·施诺尔(Leo Schnore)和奥蒂斯·达德利·邓肯(Otis Dudley Duncan)从一系列研究中发展出来,他们强调

北京市新型城市形态
缘起与构成
.....

8

自然经济因素对城市土地利用的决定性作用;二是在回应对芝加哥学派的批评中发展起来的社会文化区位学(Social-Cultural Ecology),该学派中有两个非常杰出的个案调查:沃尔特·弗瑞(Walter Firey)对波士顿土地的分析 and 克里斯顿·乔纳森(Christen Jonassen)对纽约挪威人社区的调查,他们强调非经济的文化因素即价值、信仰和约束人们思想和行为的规范对决定人类行为的作用;三是社会区域性分析(Social Area Analysis),由埃诗瑞夫·塞维克(Eshref Shevky)和温德尔·贝尔(Wendell Bell)在20世纪40~50年代发展出来,他们认为社会区域由三类组成:社会排序(阶层)、城市化和社会分隔,其研究方法是通过将城市中各个地区的社会属性界定来划分城市空间。由此,他们认为整个城市空间不单是由空间标准决定的,更是由具体的社会特征来决定的。

第三个是人种论(Ethnographic)。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的一系列人种论著作把研究的焦点对准了社会黑暗面,如无保障者和流浪汉。代表著作有斯瑞瑟(F. Thrasher)1927年写的《团伙》(*The Gang*),安德森(N. Anderson)在1923年写的《流浪汉》(*The Hobo*)和泽伯夫(H. W. Zorbaugh)在1929年写的《黄金海岸和贫民窟》(*The Gold Coast and the Slum*)。他们最先运用了人类学的技术,对现代社会进行了微观研究,他们有意识地将社会互动、现代社会内部社会互动的变化以及社会改良三个基本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运用于实证的、有特色的调查过程中,因此他们又被后来的学者称为最早的现代性研究者。

在同一时期,还有学者专门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城市形态及其发展进行研究,一般称为城市文化学派。主要代表学派有以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为代表的“生活方式”派和以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为代表的“现代文化”派。此外,卡特(Carter)从行为心理的角度来分析城市形态的发展历史及其规律,同时研究城市形态发展与社会阶层分布模式和人口迁移规律之间的关系。韦伯(W. Webber)在分析人口分布和土地利用的基础上,建立起城市形态演变的模型。

(2) 国内城市形态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

国内学者对城市形态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的研究大部分是从宏观视角出发,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形态及其形成机制进行了研究。例如,顾朝林等(1997)认为引导起城市社会极化的动力因子主要是转型期中城市功能结构的转变、外国直接投资和流动人口的涌入;吴启焰等(1999)则认为社会空间分异的动力机制源自1978年以来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日益强化的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劳动分工,以及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核心的知识经济及其影响下的经济结构变化。

也有学者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文化和城市形态特征之间的关系作了分析。马武定(1998)认为城市作为人类文化科学技术历史淀积的物化,承载着人类

文化与科学技术进步的历史,为人类未来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创造提供文化资源将成为未来城市最基本的功能之一;王农(1999)指出特定的城市形态反映这一地域特有的文化特征,现代城市空间应该充分体现群体文化意识的整体性和多样性;陈力等(2000)认为在城市形态演化的动态过程中,人类文化塑造了城市的空间形态,延续进化的城市空间形态反过来又影响人类行为。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城市形态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基本上集中在单个城市或地区等微观研究领域,具体的研究视角呈多元化特征。例如,林拓(2004)从农民市民化的角度出发,认为城市社会空间形态的转变与农民市民化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正是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不断地促进着社会空间格局从分散布局到空间体系的构筑、社会空间流动从地域凝固到空间开放的催化、社会空间治理从政区分割到区域联动的形成,这一系列重大变化表明,农民市民化既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社会进程,同时也是城市形态变迁的空间过程。李祎等(2008)认为,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进行分析对研究中国边缘城市的兴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他认为,在中国,发展势头迅猛的郊区建设并不仅仅是因为居民想拥有更好的生活环境,而是与中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战略及受到大量政府因素的干预相关,但政府管治的具体形式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殊性——地方和区域的政府企业化管治,而不是“当地的中产阶级联盟”或“城市增长机器”。王军(2007)以江苏省为例,从人口城市化过程和空间组织互动的一般原理出发,探讨了人口城市化过程对促进区域空间组织的多方面影响,指出人口分布在城镇空间上的重新优化组合引导着区域城镇空间不断向高级化方向演进。

可见,学者们对城市形态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关注城市的外在形式到关注城市的社会形成机制、关注人的行为及其与城市的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一过程和城市形态自身的变化息息相关: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起激发了人们对城市建设、工商业布局等外在形式关注的热情。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使得人文主义思潮兴起,人们开始深入地从社会、经济、人类自身的角度对城市发展进行反省和探究。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识化的迅速扩散,城市不再是一个独立发展的主体,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城市形态进行前瞻性的规划、引导成为摆在全社会面前的问题。我国学者对城市形态的研究是从引进西方的城市形态理论开始的,所以,具有从理论到实践逐步过渡的特征。由此看来,城市形态的发展是历史的一种必然趋势,这种趋势可以概括为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是物质空间结构的变迁,二是社会人口方面的变迁。这为北京市创建新型城市形态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从现实来看,北京市所面临的全球化背景和国内的社会变迁对北京市的城市形态提出了现实要求;此外,北京市已有的条件和正在或即将实施的措施也进一步说明,创建一个新型的城市形态是完全